

# 数字异化：表象、根源及其破解途径

成 龙，王 楠

**摘 要：**数字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当代表现形式，渗透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各个维度，突出表现为“数据崇拜”“无形剥削”“虚拟交往”“赤裸生活”的普遍现实，成为“人受抽象统治”的当代形态。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全面联姻则是造成数字异化的根源。具体言之，数据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导致新意识形态幻象，产消合一生产方式模糊劳动与休闲的界限，数字平台的私有属性与逐利性质诱发交往异化，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殖民。扬弃数字异化，其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唯物史观，消灭数字技术占有和运用的资本逻辑。一是建构数据资源共享环境以规训数据资本；二是重构数字生产关系以释放新生产力；三是构建数字共同体以抵抗虚拟交往异化；四是运用人民逻辑更替数字技术的资本逻辑。

**关键词：**数字异化；异化现象；异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2)06-0001-11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1026.004

以数字化、自动化、虚拟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技术深刻变革人类的劳动形式，不仅带来资源高效配置与解放生产力的技术进步成果，也使得支配人的异化力量获取崭新形式。从根本上讲，数字异化并没有脱离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异化的框架，是劳动异化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是更为抽象、更为隐蔽、更为广泛、更为强烈的异化形态。然而，数字技术到底造成怎样的异化样态，如何解释它的出场逻辑，如何走出数字异化的藩篱，这是理论界仍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力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数字异化的存在方式、产生根源及其破解途径进行深入研究，为构筑现代化数字治理新格局，实现数字正义，形成网络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 一、审视异化之象：数字时代异化形式的深刻重构

事物的本质必然表现为某种或某些现象。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到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技术以数据化、智能化、虚拟化、精细化、个性化等特征对传统物质劳动方式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劳动形式的历史嬗变诱发异化形态的数字化转变，突出表现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四个维度。

### (一) 从“相信数据”到“崇拜数据”

作为数字技术核心的数据，起初是一种受人信任的信息载体与认识世界的工具，将人类认知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19ZDA016)

**作者简介：**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gdclong@163.com(浙江 杭州 310058)；王楠，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力提升至崭新境界。如今，数据发展为一种衡量“万物的尺度”与受人崇拜的“非神圣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对人的异化力量。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认为，“万维网诞生之初，人类就对其怀有一种近似宗教崇拜的情怀”<sup>[1](P3)</sup>。此种技术崇拜现象是数字拜物教的出场前提与数字化在思维方式上的重要表现。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带来科学认知方式的重大变革，使得以往用理论范式分析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渐趋式微。大数据主义从最初的一种重视量化分析的哲学思想，转变为主张“数据至上”的新经验主义。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通过对“小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差异的比较研究发现：处在大数据时代的个体不再将理论范式研究奉为圭臬，而是转向对数据范式的重视<sup>[2](P92)</sup>。此种对数据分析方法的深度认同与信任逐渐衍生出数据主义，即认为海量数据以及数据挖掘等技术使得以往的科学研究范式失效，人类可以通过数据所反映与描述的信息去探知事物之间的联系，无需依靠基于因果逻辑建构的理论范式去深究其形成的内在机理与运行逻辑。以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为代表的大数据主义者认为，个体乃至国家的决策应当从经验与感性直观中逐渐抽离，转向对数据分析方法的倚重<sup>[3](P93)</sup>。数据主义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关关系可以替代因果关系。譬如搜索软件预测流行性疾病的算法程序，通过检测“发热”“头痛”“咳嗽”“喉咙痛”“四肢无力”等词条的实时检索量来预测流行性感冒的出现，不通过症状、病因与疾病传播之间因果关系的联系，而是直接通过数据寻找相关性结果。二是强调量化的价值评判标准。量化的评价标准深刻嵌入个体生活日常，薪酬水平、消费习惯、信用额度等量化考察的数字符号，为每个人画像，现实世界里异质的、多维度的人在数字平台中降维成单向度的“数字人”。在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来，人类在大数据时代被完全可计算的、普遍自动化的、远程控制的数字化技术所裹挟，以至于丧失知识、思维能力与主体创造性，沦为“知识无产阶级”，其本质是人类获取理论知识能力被剥夺，最终导向“系统性愚昧（Systemic Stupidity）”<sup>[4](P129)</sup>。

从对数据和算法的信任与认同，到“理论终结”“数据为王”的口号泛化发展，世界被不断地细分、数字化、抽象化为微小单元，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围绕着数据进行，越来越陷入到“数据漩涡”的泥沼。此种数据崇拜观念反过来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拥有统治人的观念的力量。“当数字技术嵌入当代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意识形态一同被赋予了神秘的性质。这意味着除了商品的拜物教，当代还出现数字拜物教。”<sup>[5](P299)</sup>而当个体将部分主体性与话语权让渡给数字技术，臣服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数字化的拜物教形式也就此诞生。或者说，“一个基于知识与创新的技术乌托邦即将来临或已经到来”<sup>[6](P105)</sup>。

## （二）从“有形剥削”到“无形剥削”

工业时代的异化劳动集中表现在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劳动行为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sup>[7](P160-163)</sup>。如今，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渗透到全球生产实践的各个环节，非物质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成为数字时代劳动形式变革的关键词，无产阶级所希冀的剥削消逝的技术解放图景并未到来，剥削只是从有形剥削转化为更为隐蔽的无形剥削。

数字劳动是以互联网平台为生产场域，以数据（知识、情感、经历、技能等信息）为劳动对象，生产与创造价值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就生产场域来看，数字劳动以其特有的技术先进性突破了传统工业时代生产的时空局限性，将劳动主体从固定生产空间与时间的桎梏中释放出来。然而，休闲与劳动的时空边界也因此逐渐模糊。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再劳动，人们‘显示生产’：这是生产和劳动文化的终结，由此对立地出现‘生产性’一词。”<sup>[8](P23)</sup>用户依赖社交网站用以交流，他们每一次上传、浏览、点赞与评论等数字活动都为其创建主要产品，并且被其视为“免费劳动力”。“资本家不向用户支付使用其服务

的费用，这类似于工业资本家可以不向工人支付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正在进行的交易。正如工人不工作就得不到工资一样，用户在不放弃对其数据的重要权利的情况下也无法访问他们需要的服务和平台。”<sup>[9]</sup>美国学者特雷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认为，信息网络是具有休闲与生产双重功能的场域，既作为“游乐园”也作为“工厂”存在<sup>[10](P3)</sup>。就生产过程来看，量化考核标准作为数字时代商业公司的重要管理策略，逐步形成“数字泰勒主义”这一监督与规训数字劳动者的权力形式，加剧了技术理性逻辑对人的支配与控制。与19世纪泰勒制科学管理体系下的劳动者命运相似，数字劳动者被物化为生产机器的“零件”，面临着全方位的监视与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为实现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加速运转。由于数字平台的全面监视属性、数字化的评价考核标准以及数字劳动者工作合同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包括Google、Amazon、YouTube在内的数字巨擘公司所雇佣的数字劳动者面临严峻的精神健康问题与失业危机，部分员工在休闲时间甚至以精神药物来消解压力与麻痹情绪<sup>[11]</sup>。

伴随数据的爆发式增长与资本增殖逻辑宰治下的扩张性生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揭露的工业资本主义背景下物质财富增长与劳动者贫困状况之间的悖反关系与异化劳动现象，以隐蔽的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发展。

### （三）从“现实交往”到“虚拟交往”

在资本主义初期，商业成为人类交往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sup>[7](P105)</sup>。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与社交网络的兴起，从物理空间的现实交往到数字空间的虚拟交往，从传统社会以物质交往为基础到信息社会以数字交往为主要途径，在交往形式的深刻转变过程中个体交往日益疏离、数字鸿沟的代际差距严峻以及社交平台内容泛滥等异化风险也随之显露。

部分学者将数字技术视为民主赋权与促进公平的工具，认为数字平台上的自由交往活动使得个体充分获得讲述生活、公开观点、自由交往与表达创造力的机会，“我们正被迅速地推向一条主要由新技术决定的民主复兴路线”<sup>[12](P186)</sup>。与前互联网时代的现实交往相比，基于数字平台的虚拟在场“无菌交流”形式的确丰富了交往途径，并且将交往效率加速至“实时”状态，与此同时，去空间化的交往方式也引致疏离的个体交往体验。譬如城市空间的数字化及其导航装置使外地游客无需与当地建立交往联系，通过线上行动即可探索陌生地域的广袤风景或人文景观，广泛的虚拟交往进一步挤压了现实交往形式的存在空间。由于在虚拟交往过程中，“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sup>[13]</sup>，这个“虚体”或称“数字替身”成为个体的新型身份以开展与他者的社会交往，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数据与数据的关系，个体除了感到交往活动与信息获取的空前便利外，也在虚拟交往的疏离体验中削弱现实交往的沟通能力。在互联网行业正在搭建的“元宇宙”中，进行虚拟交往的个体将真正身份隐藏在“数字替身”背后，难以进行基于现实的、具有情感的交往实践。交往方式的数字化转变不仅深化个体的疏离体验，还促使数字弱势群体的出现。区别于20世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差异”的数字鸿沟状况，目前的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在代际差异上。数字时代老年群体感到被一定程度地边缘化，成为数字鸿沟中的数字弱势群体，在普遍的数字化社会生活中手持非智能设备或无法操作设备的数字边缘人群只能茫然无措地止步。有学者认为，“社会的、种族的或者经济的力量在如今都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力，代际差异才真正举足轻重。现在年轻人是富有者，而老年人是匮乏者”<sup>[14](P238)</sup>。

随着社交网络的内容泛滥与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得以更加自由地获取知识，并进行生产与交往，但同时，人们在日益扩大的回声室效应下难以获得真正有效的信息。在这个“回响”巨大的信息茧房中进行交往活动以维护社会关系的个体都面临着交往异化的风险。

#### （四）从“隐私生活”到“赤裸生活”

在传统工业时代，生活领域属于个体的“隐私领域”。而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重构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基于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构建的数字空间承载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生活赤裸地陈列在数字平台，隐私成为数字时代的“奢侈品”。

电商、共享出行、共享教育、网络协作到在线金融等数字技术的现实应用无疑使得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但是，当数字化、虚拟化与可计算成为数字时代个体共同的生活感受，数字终端广泛地渗透、填充甚至开始架构生活的各个维度，人们的日常经验被即时转化为数据进行永久存储，处在数字化生存的人沦为程序运行的被支配者。每一位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其生存环境与边沁构想圆形监狱中的囚犯相同，都被中心瞭望塔（数字劳动者被数字平台与背后的数字资本）所监视与控制，区别是数字劳动者更多是迫于生计或追求愉悦，而非惩罚性的规训。过去被管理者用来甄别可疑的对象的监视技术或者管理办法，如今以数据化和算法治理的形式应用于所有人。个体上传到云端的数据，成为脱离数据生产者的对象物，复制出无限副本，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熵增状态无法停歇。从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等社交软件到政府主导的公民参与系统数字平台，使用数字平台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与数字技术最直观的交互体验，数字技术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政府、国家与国家之间将时空进一步压缩。个体成为平台上罗列展出的“数字景观”，身处“每个人都控制着每个人”<sup>[15](P80)</sup>的“透明社会”之中，无法逃脱“赤裸”生存的境遇。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平台使全球化进程在思想层面达到空前的高度，也使得消费主义思想更迅速地传播与深化。“消费的‘自由’就如同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自由出卖一样”<sup>[16](P67)</sup>，大数据的全面采集与计算，一定程度上节约消费者的时间与金钱，也为生产者指引方向减少生产盲目性，但是资本逻辑操纵下的媒体将受众转化为消费者，消费主义搭载数字平台发展，甚至衍生出专属的节日与语言，充斥着消费主义色彩的节日伴随着数字资本的狂欢，将各色的广告塞满用户的电子设备。

我们在讨论数字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疏离、异己、压迫与束缚遭际之时发现，它既区别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下工人像“逃避瘟疫”般畏惧的劳动异化，也区别于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野下时间永恒而空间坍塌的扭曲中诞生的“新异化”。此种新型异化的主体，不仅包括数字劳工、“玩工”、数字平台使用者，还涵盖着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数字世界的所有人。除主体广泛外，异化的痛苦也相较原有的异化形式更为隐蔽：人们除了技术加速带来的眩晕感外，还感觉到“自由”与愉悦。数字技术异化的遮蔽状态，不仅是“劳动”与“休闲”的边界不再分明，更在于人们被剥削的现实被隐匿在资本构建的技术乐园背后。

## 二、挖掘异化之源：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全面联姻

随着资本增殖欲望对信息化与数字化进程的渐趋渗透，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深度嵌合实现了对人类思维、生产、交往与生活的全方位操控。自动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了数字拜物教的思想基础，生产与消费的时空融合遮蔽了数字劳动的剥削特征，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数据价值链吞噬了数字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对现代生活的全面殖民，构成数字异化的主要原因。

### （一）数据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导致新意识形态幻象

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据从最初纯粹的信息载体转变为一种商品形式与资本形式，具有了私有属性。数据成为私人占有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数字社会经济基础创造出“自动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反过来维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况，继而为数字拜物教与大数据经验主义等数字异化现象奠定思想基础。

以数据生产资料为核心的数字资本创造出一种虚假认同和遮蔽现实困境的“自动化的新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即倡导市场无需政府组织、完全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数字平台配置,宣扬自动化的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劳动者获得挣脱剥削与贫困的束缚从而获得自由。该意识形态的拥护者认为,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并驾齐驱,可以作为一种创新路径解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资本主义由技术科学为核心的数字平台配置与助推,数字资本又反过来驱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个性化产品与服务;数字平台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市场,为资本主义注入活力与生机,并与其协同发展<sup>[17]</sup>。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数字资本主义出场之时即否定了上述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存在一种创造虚假认同和遮蔽现实困境的新意识形态,“景观是杰出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其圆满中展示和表现了任何思想体系的本质:对真实生活的穷困化、奴役和否定”<sup>[18](P135)</sup>。数字化社会景观建立在自动化生产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之上,以层出不穷的技术产品向世人展示其旨在缔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数据崇拜者所相信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图景中,通过健康监测、疾病预测以及数据整合,可以延长人的自然生命并延伸至数字生命的“永生”状态,从而达到人的解放要求。这种徘徊在抽象“符号”与虚拟“景观”之中描绘的数字资本主义“美好未来”,是大数据经验主义者与数字拜物教对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后果的误判。在强调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与扩张性资本逻辑的强势影响下,市场依赖数字平台的自动化算法,商业公司推出更具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个体面向一种工具化的思维方式与结果,“工业理性和技术的蚕食耗尽了日益现代化的社会本质,使得人类的充满生机的关系成为工具理性的”<sup>[19](P103)</sup>。我们沿着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逻辑对其进行剖析,可以发现数据从其成为生产要素并且衍生出商品形式的那一天起就拥有了“谜一般的性质”<sup>[20](P89)</sup>,数字拜物教的背景依然没有脱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的数据产品同样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sup>[20](P93)</sup>,数的形式也掩盖了数字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数字劳动者的关系,“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sup>[20](P93)</sup>。

数据异化是数字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数据从信息载体到数据商品与数据资本的过程,也是数字异化的生成过程。数据被虚假的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修饰与美化,使得人们在数据主义者编造的技术解放愿景中臣服于抽象符号之下,囿于“数据至上”的理论困局,进一步加深对数据的依赖与对数据资本的盲目崇拜,这是构成数字异化的重要原因。

## (二) 产消合一的生产方式对劳动与休闲界限的模糊

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合催生出“产消合一”的新型生产方式,将生产与消费、劳动与休闲的界限模糊,遮蔽了数字劳动过程的剥削现实,诱发生产维度的数字化。互联网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浏览、每一笔消费都沦为数字化生产的环节,在无形中被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异己存在。

尽管与以往劳动形式相区别,数字劳动具有非物质性、非消耗性、可分享性、便利性与享乐性、受空间限制小、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等特点。数字劳动也因其特点带来劳动与休闲、私人与公共、生产与消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模糊,看似非物质性生产的、便利的数字劳动,脱离了工人如“逃避瘟疫”般逃避劳动的遭际。而事实上,数字劳动者面临着绝对剩余价值与休闲时间被盘剥蚕食的状况,正如马克思对19世纪工人生产与收获间矛盾的深刻披露,“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越贫穷。工人制造的商品越多,他越变成廉价的商品”<sup>[7](P156)</sup>。数字劳动者耗费时间、精力、生命来进行数字劳动的同时,其生产与消费、劳动与休闲的界限被模糊、被遮蔽,就连作为消遣的游戏也被异化为劳动生产的实践。数字劳动只是被数字技术具备的便利性与享乐性所遮蔽,并未改变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互联网用户无偿地上传自己的信息与状态、游戏玩家投入时间与金钱换取绮炫的虚拟装备、数字劳工开发代码释放大量生产力却得不到同比的报酬，大量数字劳动者“沉迷”于数字世界中无法停歇地点击鼠标、滑动屏幕，机械地浏览、上传与生产。数字劳动者看似自由地进行生产实践，但是生产出的数字产品却不为自身所用反而成为异己存在物。用户时间与生命被数字资本淹没，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拥有者的权力不对等程度日益加深，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与数字劳动者回报近乎“无偿”的悖论持续存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越多，数据所蕴含的价值与财富越多，数字劳动者反而愈加相对贫困，数字平台雇佣的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平台的用户共同遭受数字劳动的剥削。与数字劳动相伴随的自动化生产，在提升生产效能的同时，加剧了劳动者的竞争压力与失业风险。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原则渗透到数字生产全过程，与排斥劳动者的自动化技术共同加剧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继而阻滞人与技术的和谐发展。“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sup>[20](P495)</sup>

数字劳动者的遭际不是源于数字技术、平台或装置，因为“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sup>[20](P508)</sup>，而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资本主义现实中，劳动者的生产方式成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新型增殖方式，沦为异化的劳动；劳动者的消费过程无法摆脱自动化算法与信息茧房的操控，沦为异化的消费。

### （三）数字平台的私有属性与逐利性质诱发交往异化

资本逻辑渗透到数字化交往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数字平台被赋予了私有属性与逐利性质，社会交往沦为获取数据生产资料的牟利工具，人的主体性、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在工具理性、数与数的关系之下，促使本应促进人类交往实践的数字平台成为阻滞交往的异化力量。

数字平台在扩张性技术和市场逻辑的驱使下，重组了人与数据的关系，最初服务于社会交往实践的目的逐渐消磨，转变为一种从人类数字交往活动中提取数据以谋取利润的手段。在诞生之初，数字平台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架构起全新交往模式，打破了前互联网时代人类交往活动的旧有秩序，成为全球信息交互集散与社会交往的新场域，广大用户将其视作信息获取、日常沟通与休闲消遣的重要载体。人类交往行为被数字平台赋予实时性、公共性、虚拟性等新特征，整个社会交往关系被深刻嵌入到数字化界面中。数字平台日益发展为个体建立与维系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个体为了不被他人疏远只能衍生出虚拟形象以在线状态进行交往实践。在扩张逻辑的支配下，各个数字平台运用资本手段与技术策略将用户及其产生的数据进行“数字圈地”，以达到侵占市场份额与赚取利润的目的。在这场数字时代的圈地运动中，个体卷入数字平台的“漩涡”中以虚拟性、匿名性、不稳定性的数字身份沦为生产过程的无偿劳动者。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用“平台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将数字平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揭示出平台资本走向垄断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个体的无形剥削与潜在控制。在现代科学中，技术手段被认为是受活动主体控制的对象，但是随着数字平台的扩张与垄断，主体却反而沦为技术对象的附庸。在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看来，绩效原则统御着数字交往过程，主体与技术对象的关系被颠倒，技术对象反过来限制主体的交往，致使主体的交往异化程度加深<sup>[21](P30)</sup>。事实上，数字交往与平台逐利的过程无法脱离人，依托计算机和光纤的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并不能代替人的认识主体地位，信息、数据、知识都是面对人的概念，数据的生产、上传、编码以及最终的交换过程都是围绕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人在生产与交换包含人的信息的数据。

探寻数字时代交往异化的秘密并没有否定虚拟交往形式与数字平台本身，而是回到马克思的交往异化批判理论，认识到资本逻辑的宰治下的数字平台构建出新的交往模式，将人类交往过程限制在虚拟空间中以窃取数据与牟利，构成当代人的交往实践活动的异化根源。

#### (四) 资本增值逻辑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殖民

资本增值逻辑对人类数字生活的全面侵入, 使得“时间节约型经济”的数字泰勒主义模式日益稳固, 个体的居家生活、休闲娱乐、沟通交往、旅行交通等各个方面都被其窥探与控制, 催生出人类生活维度的数字异化。

时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 也是资本实现增值要求的价值源泉。马克思通过对时间概念的剖析与厘定, 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揭示资本家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秘密。19世纪的机器大工业时期, 机器对工人阶级的抽象统治建立在对其劳动时间的无偿剥夺与占有基础上。“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 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值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sup>[20](P169)</sup> 21世纪的数字资本主义时期,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 进一步深化了对无产阶级生活时间的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的智能性、共享性、娱乐性特征下, 掩盖了数字资本对无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全面殖民与日益严峻的阶级差异。“玩工”即是无产阶级被剥夺休闲时间沦为机器的有力证明。由数据书写的虚拟世界里可以轻易地获取乐趣与满足感, 这种体验让“玩工”意识不到休闲的过程成为了一种劳动, 为游戏公司、社交软件、短视频软件等数字平台上瘾地提供着无偿劳动, 在“愉快”的环境里被规训为商业公司的“点击工作者”。“尽管这种利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并没有感觉像是在利用, 因为数字化劳动看似是一种玩乐劳动, 将剥削的现实, 隐藏在与其它用户联系和接触的乐趣的背后。”<sup>[22](P281)</sup> 个人在数据所有权的意义上被奴役, 自动化的信息收集以及无处不在的“永久存储”, 使新型信息“奴隶主”的兴起成为可能。英国学者贾森·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认为, “如果我们把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得出结论, 最终目标是实施一个彻底的转变: 我们不是成为任何东西的所有者, 而是成为一切东西的租赁者, 而授权协议使我们无力。这些合同使我们失去了决定我们所生活的数字世界规则的任何效力。他们强制执行一种单方面的权力, 使制定合同条款的公司有利”<sup>[23](P63)</sup>。互联网用户付出的时间与数据相应的价值没有复归自身, 反而被数字化原则与资本扩张性逻辑裹挟, 不得不生存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遮蔽之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sup>[20](P135)</sup> 在人的数字化生存状况中获得更丰富的意蕴。

### 三、破解异化之路: 人类走出数字困厄的逻辑可能

以数字技术为动力、以新能源为生产要素的“智能化”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前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状况。因此, 沿用并发展数字技术是别无选择的现实状况, 真正的问题是: 如何应对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新异化现象?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度, 是探求扬弃数字异化的出发点与理论根基。扬弃数字异化, 必须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数字技术进步本质联袂, 即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实现高质量数字化生产的共同作用下, 找寻数字时代人的解放可能, 展望数字社会主义惠及全人类的可能样态。

#### (一) 构建数据资源共享环境是规训数据资本的必然道路

坚持共产主义的历史方向,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数据资源共享环境, 将数据资源、产品及其产生的利润为人民所使用, 防范数据资本无序扩张, 引导数据资本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力量, 可以驱散数据被其私人占有的商品形式与资本形式所带来的意识形态迷雾, 也是破解数据迷思与打破数据垄断的必然道路。

数据资本是数字资本的核心形式, 是一般数据的价值增殖结果, 其前提是数字技术与数据的私人占有, 其本质内核是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对数字劳动者生产的一般数据进行无偿攫取以实现获

利。构建数据共享环境，就是对数据的属性进行规定与划分，明确区分作为生产要素的一般数据与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数据，将核心数据与一般数据根据其重要性与实际运用的区别，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分级分类，确立不同权限访问限度与保密要求，将数据与数据资本的私人占有转变为公有形式，消除数据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无偿剥削，让一般数据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服务，是扬弃数据资本造成的异化风险的有效方案。

限制数据资本的无序扩张，需要发挥国家公共权力对数据资本的规制功能。数据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使得原本价值中立的数据、数字技术被扩张逻辑裹挟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存在，因此避免数据资本的无限扩张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现代国家的重点治理方面。国家公共权力规训数据资本的展开需要循序渐进。首先，国家要对数据进行确权，将个人数据、国家数据与公共数据等类型进行明确区分，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来进一步明确数据的归属问题。其次，国家要保障公共数据的共享共用，将其导向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公共目的，防止数字公司的数据垄断行为，为数据资本的公有化改造而创造条件。对我国来说，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着力构建数据资源共享环境以规训数据资本的无序扩张，同时利用数据资本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实现数字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数据和数字技术都应当作为赋能社会生产的动力存在，我国应当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过程的深度嵌入与有机融合，在解放生产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改善人的生存境遇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数据的崇拜社会、恢复人的主体地位是破解数字异化的原初目的。

## （二）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是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扬弃数字异化，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上探讨重构数字生产关系与解放数字生产力的具体方案，是消解“产消合一”造成的劳动与收获不相等难题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必要理论批判武器。数字技术的大规模普及提升了劳动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从而掩盖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数字劳动不因其被称为“虚拟劳动”“在线劳动”“非物质劳动”而仅作为抽象劳动，生产者与互联网用户的数字劳动也在具体地生产着不同的数字产品。商品价值体现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数字产品同样凝结着数字劳动者的时间与生命并成为客观于主体的对象，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数字劳动不因其虚拟性而丧失劳动的二重特性，编程或修补漏洞等具体的数字劳动与付出了数字劳动者时间与生命的抽象数字劳动都在生产价值。数字资本积累的“秘密”在于将个人信息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数字资本。将本属于数字劳动的价值“注入”或者复归本身，可以解蔽用户作为劳动者的身份被数字资本、技术带来的快感与满足感所隐匿的异化样态。

由于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破解异化宰治必须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在所有制关系上寻求超越性的解决方案。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缔结并未改变数据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数字生产的根本矛盾。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所有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数字劳动者真正平等地掌握生产资料及劳动成果，才能彻底消除数字劳动者同数字产品的割裂与对立状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sup>[7](P185)</sup> 技术为发展与解放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为异化的扬弃创造物质条件，数字技术在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颠覆性变革，世界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阶级差异与对立状况在更大范围内加剧，这为超越数字资本主义与实现数字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是充分激发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指出:“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sup>[24](P97)</sup>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时刻关注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警惕数字资本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无限扩张与商业侵蚀。具体而言,以数字化动能驱动产业变革,总体性地推动社会化大生产,极大地丰富数字产品与物质产品,需要国家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保障公平公正的数字生产环境,确保生产成果为劳动者所使用,最大限度地激发数字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活力与动力。

### (三) 构建数字共同体是抵抗虚拟交往异化的重要途径

破解数字时代的交往异化,要重塑在数字化生存中人的主体性,在数字共同体中建构人与人、主体与技术对象之间的和谐关系。

面临虚拟交往异化现实,我们需要具备回归马克思私有制批判路径的理论自觉,通过建立公有制的数字平台来塑造积极的交往实践模式,这是构建数字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交往实践本身是现实的个人的“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也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物质生产与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同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揭示交往异化的根源一致,数字时代的交往异化仍然逃不开私有财产与私有制下的生产环境。虚拟交往是当代交往实践活动的主要形态,并不是天然地被资本逻辑所支配,通过对数字平台的公有制改革,可以走出平台资本的“数字圈地”,运用平台本身的中介功能将离散的个体聚合,形成数字无产阶级的凝聚力量,将人从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对立中释放出来,带来具有实时性、虚拟性、流动性、丰富性、多样性等特点的广阔式交往形态,以突破交往异化困境。

打破数字技术的黑箱性质与弥合数字鸿沟,是构建数字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数字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离不开数字技术本身的黑箱性质,通过对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育,提升人们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水平,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提高数字技术人才待遇水平,拓宽相关专业就业渠道,创造更多岗位,使全民具备“会用”“应用”“善用”数字技术的基本素质,才是真正打破技术黑箱的有效手段。消除以代际差异、区域差异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字鸿沟,关键要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推动经济创新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维护以社会正义为本质的数字正义,才可能在现实的生产与交往实践中破解个体的自我疏离、与社会割裂、成为数字机器的延伸、被数字资本驱使的状况。

站在全球视野,加强国际网络空间交流合作,是抵御数字交往异化与构建数字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世界各国纷纷高度重视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建设。新时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数字中国”的伟大构想,正是建立在世界人民交往活动与全球数字化进程的现实基础之上。我国正在积极投入全球数字合作平台建设当中,抵制数字霸权垄断,营造开放、合作、共赢的数字生态环境,推动优质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生产与传播,加强各国文化在互联网平台的交流互鉴。我国在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加强数字中国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各国数字贸易合作与打破数字壁垒,让世界人民共享数字文明成果,为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与数字世界的和谐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 (四) 运用人民逻辑更替资本逻辑是破解异化的必由之路

数字技术内蕴的工具属性本身是价值中性的,但是为不同的阶级所运用就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运用人民逻辑扬弃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风险,将数字技术从资本逻辑的控制与支配之下释放出来,才能更好地将技术成果惠及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逻辑的核心要义,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消灭数字技术异化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来建构新型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防止阶级分化,发挥人民逻辑的价值取向优势,将新兴技术要素嵌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国家

治理领域，创造更多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数字化新科技、新产品、新文明，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数字动力。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sup>[7](P377)</sup>。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积累与经济停滞的危机在数字时代日益严重，失业与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难以确证数字技术本身带给人类的解放力量。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的目标是将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作为政治操控与获取利润的工具。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逻辑将数字技术从资本逻辑的宰治下拯救出来，可以超越其创造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积累的局限性，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释放其发展生产力、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初性质。

贯彻落实人民逻辑需要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构建科学的制度和机制体系，以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颠覆性变革作用与提供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的成功，即是在现实层面人民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我们要坚持将人民逻辑与数字技术深度结合，切实维护数据正义，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各项权益，通过完善数据规制体系来摆脱“算法困境”以及规避劳动异化风险，进一步开掘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将人民逻辑根植数字化建设始终，以开辟人类解放的新道路和新境界。

#### 四、结 语

数字化的确深刻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无摩擦的自由竞争市场，但数字化并未改变也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性质与剥削本质。扬弃数字异化需要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历史关系出发，对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占有和应用进行批判和规训，使其保持良性的社会运行。后疫情时代，中国运用大数据采集控制疫情传播、使用人工智能解码病毒基因序列等数字防疫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是善用数字技术的标志性成就。从福建省作为“先头部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数字福建”伟大决策部署，到全面展开数字化改革新征程迈向“数字中国”，以数字技术为动力、经济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数字化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选择。在数字化改革中结合数字异化批判理论，以规避异化风险与迎接智慧社会，让人民享受到更大的“数字红利”。走出数字时代的新型异化困境，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全面解放提供思想和道路指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参考文献

- [1] [美]尼古拉斯·卡尔. 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M]. 姜忠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2]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3] [美]史蒂夫·洛尔. 大数据主义[M]. 胡小锐,朱胜超,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 [4] Stiegler, B.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M].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 [5] Fuchs, C., V. Mosco.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M]. Leiden: Brill, 2015.
- [6] Harvey, D.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法]让·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 [9] Milkman, R. Work intensification in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21(3).
- [10] Scholz, T.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M]. London: Routledge, 2012.
- [11] Parayil, 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Contradi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5(1).
- [12] Shirky, C.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 [13]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 *哲学研究*, 2018(3).
- [14] [美]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15] [德] 韩炳哲. 透明社会[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16] [法]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7] Birch, K. Automated neoliberalism? The digital organisation of markets in technoscientific capitalism[J]. *New Formations*, 2020(100).
- [18] [法]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19] [德]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 孙淑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德] 韩炳哲. 爱欲之死[M]. 宋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22] Fuchs, C.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23] Sadowski, J. *Too Smart: How Digital Capitalism is Extracting Data, Controlling Our Lives, and Taking Over the World*[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20.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Digital Alienation: Symptoms, Root Causes and Solutions

CHENG Long, WANG Nan

**Abstract:** Digital alienation is a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of labor alienation, which permeates all dimensions of thinking,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fe styles, and i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as “data worship” “invisible exploitation” “virtual communication” and “naked life”. It has become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human being ruled by abstraction”. The comprehensive conne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the root cause of digital alienation. Specifically, the private appropriation of data production factors leads to the illusion of a new ideology; the prosumer model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labor and leisure; the private property and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duce the alienation of interactions;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multiplication colonizes human daily life in all aspects.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abandon digital alienation is to adhere to the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and eliminate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the possession an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pecific ways to achieve it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o construct a data resource sharing environment to regulate data capital; the second is to reconstruct digital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release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third is to build a digital community to resist virtual interaction alienation; and the fourth is to apply the people’s logic to replace the capital logic of digit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alienation; alienation phenomenon; root cause of aliena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